

西南四省市利用 FDI 规模和模式的对比分析

罗海梅¹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针对就改革开放以来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利用 FDI 规模进行对比分析, 表明四省市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均呈先增后减的特征。在绝大多数年份, 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实际利用 FDI 的规模依次递减。四省市利用 FDI 的主要模式均为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三种, 且初期这三种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依次递减。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利用 FDI 的规模均长期持续振荡攀升, 因中后期后外商独资上升的幅度超过中外合资, 故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利用 FDI 的规模在四省市均递减。外商投资股份制利用 FDI 的规模在云南、四川和重庆三地波动幅度较大, 贵州仅有一年出现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

【关键词】: 西南 FDI 规模 模式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地理位置相近, 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却差距明显。在探讨四省市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时, 流入各地外商直接投资 (FDI) 规模, 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之一。关于西南地区利用 FDI 情况的研究较少, 更无对西南四省市利用 FDI 情况的对比研究。何雄浪 (2014) 研究西南和华东两个地区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发现 FDI 对西南四省和华东四省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顾剑华 (2011) 利用西南四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 GMM 估计, 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和 FDI 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发现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因 FDI 对西南四省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故就这些地区利用 FDI 规模的不同进行比较分析, 有助于解释四省市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 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相关依据。

1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实际利用 FDI 金额来反映利用 FDI 的规模。相关数据主要取自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商务年鉴》等。一是四川省数据中不包括重庆数据。根据 1997 年前的多数年份,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四川实际利用 FDI 金额均小于重庆市实际利用 FDI 金额判断, 重庆市数据在其成为直辖市前的那些年份中已从四川省剥离, 保证了统计口径的一致, 四川省数据中并不包括重庆市。二是各省市历年实际利用 FDI 金额均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外商投资股份制、合伙企业、合作开发这六种投资方式的合计值。根据重庆 2003、2004、2016、2018、2019 年的数据判断, 《重庆统计年鉴》中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包括了加工贸易等其他投资。由于其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均不包括加工贸易等其他投资, 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 各省市历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外商投资股份制、合伙企业、合作开发六种投资方式的合计值有差别的, 均取六种投资方式的合计值。

¹作者简介: 罗海梅 (1975-), 女, 贵州绥阳县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贵州县域城乡融合推进乡村振兴逻辑机理与路径研究”(编号: 21GZYB07) 的阶段性成果

2 西南四省市利用 FDI 规模的对比分析

2.1 四省市利用 FDI 规模变化趋势的对比

以美元计价的实际利用 FDI 金额来看,1985 年以来,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1991 年前,四省市实际利用 FDI 的规模均较小,但自 1992 年直到 2014 年前后,各地实际利用 FDI 金额振荡攀升,且规模扩大的程度均先小后大。2012 年,重庆市实际利用 FDI 金额相对于上一年断崖式下跌,从 2011 年的 582575 万美元骤降至 352418 万美元,此后继续振荡下降,直至 2019 年的 200080 万美元。2011 年后,尽管四川省实际利用 FDI 金额继续增加,但增幅相对于此前明显缩小,并在 2014 年达到最大值 1028794 万美元后,自 2015 年开始持续减少。2019 年,四川省实际利用 FDI 金额相对于上一年断崖式下跌,从 2018 年的 896375 万美元骤降至 307178 万美元。云南省实际利用 FDI 金额在 2015 年达到最大值 299200 万美元后,2016 年断崖式下跌至 86700 万美元,此后小幅波动。贵州省实际利用 FDI 金额在 2016 年达到最大值 96739 万美元后略有减少,并小幅波动。虽然四川省、重庆和云南省 2019 年实际利用 FDI 金额相对于上一年均在减少,但贵州这一年的金额却小幅上涨,从 2018 年的 60845 万美元上升到 67814 万美元。

2.2 西南四省间利用 FDI 规模的对比分析

在绝大多数年份,四川省实际利用 FDI 的规模最大,重庆市次之,云南省第三,贵州省的规模最小。1992 年前,虽然四川各年实际利用 FDI 的金额多为一两千万美元,比其余三地的几百万美元要高,但地区的差距并不太大。自 1992 年开始,虽然四个地区实际利用 FDI 的金额都在振荡攀升,但贵州省因上升幅度较小而明显处于最低水平。不过,贵州与其余三地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差距自 2015 年后明显缩小。从四川省市 35 年实际利用 FDI 金额来看,2012 年之前,按照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接近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川省与重庆市、云南省与贵州省两组。四川省利用 FDI 的规模大于重庆市,但与重庆市较为接近,云南利用 FDI 规模大于贵州省,但与贵州省较为接近。四川省与重庆市的规模明显大于云南和贵州。2012 年,四川省实际利用 FDI 金额继续增加,而重庆市实际利用 FDI 金额断崖式下跌,导致两地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差距大幅度拉大。自 2012 年,按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大小来分,四川为一组,重庆、云南和贵州为一组,两组的差距较大。四省市实际利用 FDI 规模除了呈现出以上总体特征外,两两比较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

就四川和重庆来看,尽管四川实际利用 FDI 金额在大多数年份均高于重庆,但在有数据的 35 年中,重庆在 1999 年前还是有 5 年的金额高于四川。1992 至 1998 年间,四川和重庆实际利用 FDI 的金额较为接近,二者的变化趋势呈犬牙交错特征。自 1999 年开始,四川与重庆实际利用 FDI 金额开始明显分化,四川规模增大的幅度超过重庆,长期处于最高水平。2010 年前,四川与重庆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差距较小,二者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额均低于十万美元。自 2010 年起,四川与重庆间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差距连续 3 年加大,之后维持在高位。四川实际利用 FDI 金额超出重庆的数额均在十万美元之上,就算是在四川实际利用 FDI 金额断崖式大幅度下跌的 2019 年,四川实际利用 FDI 金额也比重庆多 107098 万美元。

就四川和云南来看,四川实际利用 FDI 的规模一直大于云南,但在 2007 年前,四川与云南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差距不大,二者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额均低于十万美元。自 2007 年起,两地利用 FDI 的差距经历了连续 5 年扩大,之后维持在高位。2019 年,两地的差距大幅度缩小。四川与云南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额从 2018 年的 790775 万美元骤降至 2019 年的 234978 万美元。

就四川和贵州来看,四川实际利用 FDI 的规模一直大于贵州,但在 2006 年前,四川与贵州实际利用 FDI 规模的差距不大,二者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额均低于十万美元。自 2006 年起,两地利用 FDI 的差距在经历了连续 9 年的扩大并于 2014 年达到最大值 982229 万美元后,两地的差距开始持续缩小,于 2019 年降到 239364 万美元。

就重庆和云南来看,尽管重庆实际利用 FDI 的规模一直大于云南,但在 2008 年前,两地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距不大,二

者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额均低于十万美元。自 2008 年起，两地利用 FDI 的差距经历了连续 4 年的扩大，于 2011 年达到最大值 408821 万美元后转为缩小，大致在 143125 万美元的上下波动。

就重庆和贵州来看，除 1990 年重庆实际利用 FDI 金额低于贵州外，其余年份重庆实际利用 FDI 的规模均高于贵州，但差距在 2008 年前均不大，二者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额均低于十万美元。自 2008 年起，两地利用 FDI 的差距经历了连续 4 年的扩大，于 2011 年达到最大值 531034 万美元后持续振荡下降。

就云南和贵州来看，尽管云南实际利用 FDI 金额在大多数年份均高于贵州，但在有数据的 35 年中，贵州在 1992 年前有 4 年金额高于云南。2016 年，贵州实际利用 FDI 金额也高于云南。在 2010 年前，云南和贵州实际利用 FDI 的规模相差不大，二者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额均低于十万美元。但自 2006 年起，两地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差距持续扩大，于 2015 年达到最大值 257259 万美元，随后迅速缩小，并维持在五万美元之下。

3 西南四省市利用 FDI 模式的对比分析

贵州和四川从未使用合作开发和合伙的方式利用 FDI，而云南和重庆分别也只有 1992 和 2017 年出现过合作开发企业，故本文在对四省市利用 FDI 的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时，只针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外商投资股份制四种利用 FDI 的主要模式展开。

云南利用 FDI 早期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 3 种模式为主，外商投资股份制模式后期才持续出现，且其规模小于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偶尔超过中外合作。在 2007 年前，云南利用 FDI 的模式主要是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这 3 种，且金额依次降低。这一段时期，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只在 2003 和 2006 两年出现。自 2007 年开始，外商独资超过中外合资，成为云南利用 FDI 的主导方式，中外合资利用 FDI 的规模位列第二，以外商投资股份制形式利用的 FDI 金额持续振荡增加，2017 年达到最大值 35100 万美元后，转为持续减少。这一时期，合作经营与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规模犬牙交错，互有超越。以外商独资与中外合资的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远大于以合作经营和外商投资股份制的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在 2016 年前，云南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利用 FDI 的规模均在振荡攀升。在 2016 年大幅度下跌后，维持在低位波动。

贵州利用 FDI 的模式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 3 种模式为主，外商投资股份制模式只出现在 2016 年。最初几年，贵州仅使用中外合资模式利用 FDI。自 1990 年开始直到 2004 年，贵州主要通过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这 3 种方式利用 FDI，且在绝大多数年份规模依次递减。自 2005 年开始，外商独资的规模超过中外合资，成为利用 FDI 金额最多的模式。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利用 FDI 的金额依次递减。从几种模式实际利用 FDI 金额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外合资实际利用 FDI 金额从 1986 年开始持续振荡上升，于 2011 年到达最大值 23856 万美元以后，自 2012 年开始连续三年下跌。此后虽有所回升，但一直在低位波动。外商独资实际利用 FDI 金额一直持续振荡攀升，且上升幅度以 2009 年为分界点，前小后大。中外合作经营实际利用 FDI 金额一直小于合资与独资模式，且大起大落，波动幅度较大。

四川省利用 FDI 的模式早期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为主，后期外商投资股份制模式持续出现，但大多数年份规模低于其他 3 种模式。就现有数据来看，四川自 2002 年开始出现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虽然该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相比于另外 3 种模式均要小，但在 2010 年大幅度上涨，之后虽有所回落，却依然在相对高的位置小幅度波动。中外合作模式利用的 FDI 金额波动幅度以 2007 年为界，前小后大，自 2008 年开始大起大落。外商独资模式利用 FDI 的金额持续振荡攀升，且上升幅度以 2004 年为分界点，前小后大。尽管中外合资利用 FDI 的规模也持续振荡上升，但其上升的幅度自 2004 年开始明显小于外商独资，导致二者间的差距日益拉大。2003 年前，四川省外商独资模式利用 FDI 的金额低于中外合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和外商股份制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依次递减。自 2003 年开始，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股份制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依次递减。

重庆利用 FDI 的模式早期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为主，后期外商投资股份制模式持续出现，但其规模绝大多数年份低于其他 3 种模式。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利用 FDI 的规模持续振荡攀升，中外合作利用 FDI 的规模长期在低位波动，外商投资股份制利用 FDI 的规模在 2009-2012 年间大起大落，波动较大。2007 年前，除 1997 年中外合作经营的规模高于外商独资外，其余年份，重庆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三种模式利用的 FDI 规模依次递减。2007 年开始，因外商独资上涨的幅度超过中外合资，导致外商独资利用 FDI 的规模超过中外合资，成为重庆利用 FDI 的主要模式，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 3 种模式利用的 FDI 规模依次递减。

西南四省市利用 FDI 的主要模式是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 3 种，且早期这 3 种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依次递减。在 2003 和 2005 年，四川和贵州外商独资利用 FDI 的规模超过中外合资，位列第一；在 2007 年，云南和重庆外商独资利用 FDI 的规模超过中外合资，位列第一。过了这些时间点后，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在四省市利用 FDI 的规模均依次递减。外商股份制利用 FDI 的这种模式在贵州只出现了一年，在云南、四川和重庆后期均连续多年出现，但其规模并不太大。在大多数年份，合作经营与外商投资股份制利用 FDI 的规模犬牙交错，互有超越。

4 结论

以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实际利用 FDI 金额为利用 FDI 规模的度量指标，对比分析四省市利用 FDI 规模的变化情况，发现在绝大多数年份，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利用 FDI 的规模依次递减。自 1985 年以来，四川省利用 FDI 规模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均呈先增后降的特征。1991 年前，四省市不但利用 FDI 的规模均较小，而且规模上升的幅度也很小。1992 年，四川省实际利用 FDI 金额上升的幅度逐步加大，且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实际利用 FDI 金额分别在 2012、2015、2016 和 2017 从递增转为递减。西南四省市利用 FDI 的主要模式是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 3 种，且早期这 3 种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依次递减，中后期以后外商独资的规模高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这 3 种模式利用 FDI 的规模依次递减。

参考文献：

[1] 顾剑华. 政府公共支出与 FDI 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西南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 商业时代, 2011(30).

[2] 何雄浪. FDI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西南地区与华东地区的比较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7).